

规模不再是宏观政策首要目标

胡月晓

不久前,在新一届政府首次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和保证手段之间关系的阐述,表明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思路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总理指出,宏观政策更要着眼“升级”,出台的每一项政策,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为长远发展“垫底子”,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这主要靠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制度安排调整。这一表述,明确了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升级,明确了宏观管理手段——制度改革。

笔者认为,本届政府发展目标,将不再坚持以往历届政府追求规模扩张的发展目标,与之适应,宏观调控手段也由需求管理转向制度改革。

由于经济增长阶段的差异性以及经济运行体制的不同,中美之间在宏观调控

重点上,长期存在着“规模”和“效率”的差别,中国注重扩大规模,美国注重提高效率。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尽快把经济总量做大是过去30余年的最紧迫任务,尽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多种多样的问题,但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且只能在增量中解决。美国是发达国家,总量扩张的空间不大,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是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同时,美国市场经济制度完善,自由经济思想深入人心,政府不会对经济运行中的投融资行为进行直接控制。

中国经济当前运行中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主要表现为资源垄断、资源要素价格体系不合理、货币资金价格“双轨制”等方面。因此,随着宏观政策重心由规模扩张的需求管理政策转向提高效率的结构调整政策后,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就在于通过要素领域的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改革“红利”。

资源领域垄断局面将打破,对民资开

放扩大。当前中国许多矿产资源的开发、经营还存在着事实上的垄断,民间资本虽然可参与部分矿产资源的开发,但总体上民间资本还不能与国有资本平起平坐。前几年山西煤炭开发整合、云南矿产开发的集中整治,最终都让许多民资在环境、安全的名义下被迫以非市场化方式退出,引进民间资本、让多路资本在同一领域展开竞争,竞争增加通常能带来经营技术进步和运营效率提高的效果。另一个方面是资源要素价格体系完善,使之充分反映经营成本、环境成本等社会全部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打破前面所说的垄断局面,是要素价格改革的前置条件。在垄断局面未打破前谈价格改革,在利益集团牵制下只能是“涨价”的结局。

笔者认为,按李总理“形成能够长期有效的、对增强发展后劲管用的制度安排”的发展思路,以下几个领域的改革将重点获得推进。

一是国企改革,在不改变国有企业在国计民生、重大关键领域的控制地位的前提下,破除垄断局面,推进国企之间的竞争。保证国企对某一领域的控制地位,并不是需要垄断才能实现,国企之间也可以竞争。比如原先通信行业的单一垄断局面,通过逐步引入多家经营企业提高竞争,很快实现了行业的大发展。同样,我们可以在很多领域把现有的寡头垄断格局打破,通过拆分国企,引入新国企,让国企之间展开竞争。

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的非市场

化,不仅是资金价格的扭曲,而且还意味着资金分配的非市场化。作为经济活动最重要要素的货币价格如果不能市场化,那么无论实体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如何,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一定无法满足。我国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银行存贷市场利率不完全市场化,而民间借贷等其它金融市场利率完全市场化,意味着资金价格的事实“双轨制”,人为给资金错配造成了寻租空间,降低了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效率。

三是投融资体制改革。在我国现行的投融资管理体制下,政府行为对投资活动的影响主要通过注册资本金制度和项目审批制进行。虽然我国早在2004年的国务院20号文(《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出要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规范核准制、健全备案制,但政府事实上通过掌控年度《政府核准投资目录》,对全社会投资活动进行调控。在核准投资目录内,实际上民间资本是很难参与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个投资对内开放的问题。未来投融资改革只需在现有框架下更进一步,即弱化资本属性,扩大备案制、缩小核准目录,便可取得明显效果。

(作者单位:上海证券研究所)

如何看上市银行利润降不良升

余丰慧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国内16家上市银行共实现净利润3068.95亿元。16家上市银行平均日赚34亿元,同比增长12.6%,工行仍是最赚钱的银行,其一季度净利润达到688亿元。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传统五大行净利润为2349亿元,占16家上市银行的76%,相当于日赚26亿元。上市银行仍是最赚钱的上市公司,这是其他实体上市企业无法比拟的。不过,在高利润下,一季度延续2012年的情况,一些隐忧继续显露。

利润增速明显下滑。16家上市银行一季度利润同比增长12.6%,比2012年一季度20%低7.4个百分点。银行业盈利能力继续下降。笔者多次阐述过这样一个基本规律,经济决定金融,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金融。特别是在中国银行业利润60%以上来源于利差收入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实体企业好坏决定着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盈利能力。在实体企业包括实体上市公司利润持续下滑情况下,银行业的高利润是不可持续的,将随着实体经济利润走低而逐步回落。一季度上市银行利润增幅继续回落再次证明这个颠覆不破的“真理”。

不良贷款继续攀升。截至今年3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进一步增加了340亿元,且不良率上升至0.99%,已连续六季度反弹。不但保持增长趋势,而且,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双双呈现出增速加快迹象。从五大上市银行来看,截至一季度末,工行不良贷款余额比上年末增加56.62亿元,不良贷款率比上年末提高0.02个百分点;建行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加31.58亿元;中行较上年末略增9.49亿元;交行不良贷款率比上年末增长0.05个百分点。只有农

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出现双降。

上市银行利润占整个上市公司利润仍然居高不下。一季度,16家上市银行利润占上市公司总利润的比重达52.7%,比上年略有提高。银行利润如此之高对实体企业并不是好事。整个经济蛋糕就那么小,银行拿走过多,反映出实体企业就获得过少。实体企业如果被银行高利润盘剥过多而“死掉”,银行业最终也没有好果子吃,将出现利息难以收回甚至贷款本金都可能血本无归。这是一个双输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业利润增速下降既是实体经济不景气的反应,也是处理好银行和实体企业利润“蛋糕”合理分配的内在要求。

当然,银行不良贷款走高同样是实体经济、实体企业经营不景气的结果。目前,包括银行不良贷款攀升等金融领域风险已经受到中央高层等各个方面的重视。化解金融风险包括遏制银行不良贷款上升的功夫不在金融和银行本身,而在其之外,即:在于保持整个宏观经济持续景气、保持实体经济实体企业经营尽快向好。

这里面一个基本的要求是,政府、垄断国企和银行都要向实体经济和实体企业大幅度让利。国家要通过大幅度减税降费包括结构性减税和全面性减税向实体企业让利,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激活企业活力。掌控石油、电力、煤炭等基础性产业的国企要向企业让利,合理确定产品价格,减轻实体企业生产的成本负担。银行业更要大幅度向企业让利,央行应该继续通过降低贷款利率的不对称加息,缩小利差,让利于企业;商业银行除了正常的利差收入以外,不能派生出乌七八糟的、面向企业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收费。

总之,实体企业好,银行才能好,整个宏观经济才能好,只有企业活银行才能活。

减持与业绩挂钩 遏制新股圈钱

翟恒山

中国股市存在的较严重“三高”现象,使股市扭曲成为“投资者的天堂、投资者的地狱”。如何设计出上市公司、投资机构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能够兼顾平衡的制度,是目前中国股市的当务之急。在“三高”发行中,产业资本联手金融资本利用“网下定价、网上发行”的机会哄抬发行价格,然后在锁定期满后大量减持,这种现象不改变,中国股市便没有希望。

笔者认为,减持与业绩增长承诺挂钩、中介服务费分期兑现以及市值配售三项制度,可以较好地解决现行新股发行中的问题。

企业上市必须按市场规律和会计准则实施。融资价格的基础是公司的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每股收益、市盈率,不能漫天要价,应设置最高限价。问题关键是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一般而言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往往具有政策鼓励和科技含量高成长性,融资用途往往符合

产业发展方向,所以上市公司和主承销商、网下配售对象往往在这点上大做文章,甚至弄虚作假假借高收益,但这些都所谓的高成长和创新创业企业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上市公司(包括参与投资的PE)和主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必须在《招股说明书》中根据公司的成长性去合理计算设计未来一年至三年的净利润增长率指标,并以此作为定价依据。同时,不能把风险全丢给投资者,应该规定未达预测的利润增长率目标之前,发行人不得减持其手中的股票,而主承销商、上市推荐人在公司上市后可以提一笔10%至30%的合理费用,其余则必须在上市公司完成计划利润增长率指标后按一年至三年分期兑付。同时,证监会也应对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指标的制订和完成的情况加强监督检查,严厉打击信息披露披露的真相。

相信通过上述制度的改革安排,上市公司、主承销商和上市推荐人等会慎重地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合理的增长率指标,

确定合理的上市价格,并会十分勤奋地努力地地完成它,从而上市公司的高价高市盈率发行的恶劣圈钱现象,必将能得到比较彻底的控制。

与此同时,还要抑制短期投机资金炒新,制造严重泡沫的现象。比较好的方法是在创业板和中小板股票发行上市时,废除目前的“网上询价、网上发行”的办法,对原股票持有者的持股市值实行“优先权”,按比例配发(数量少的新股可以捆绑发行)新股,该办法曾在2002年后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比较成熟简便,受到广大投资者的欢迎,许多老股民至今仍念念不忘。目前香港一些股票发行,据了解也仍旧实行该办法。

该办法的最大好处是新股发行后股权比较分散,机构和庄家收集筹码和打压洗盘将花费较长时间,这就堵死了各路坐庄的短期投机资金急拉狂炒小盘股的可能。中小投资者也不必再盲目跟风追涨杀跌,而可以根据自己持有的绩优成长股低价获配新股,从而从容愉快地操作,让新

赵红霞涉嫌敲诈官员案移送重庆检方



不雅视频功劳大,赵红霞成“反贪侠”。先以美色去贿赂,再用视频来敲诈。石榴裙下蛀虫醉,廉政风中抓贪官。红颜祸水是借口,权力失控最可怕。唐志顺/漫画 孙勇/诗

焦点评论

算法经济 | Li Bin's Column |

社会组织亟待浴火重生



李斌

中国红十字会的丑闻在四川芦山“4.20”7.0级强烈地震期间掀起了新一轮的波澜,这再一次凸显了对各类社会组织进行改革的紧迫性。在今年两会期间,官方正式宣布,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以及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的登记,不再需要报请行业主管部门进行事前审查,只需到民政部门直接办理登记手续。这表明社会组织的改革不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且可以付诸行动了。如同已经进行多年的村级选举改革一样,社会组织的改革也是一种民主改革,它意味着公民权利的扩大,意味着公民自治形式的发展。

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主要可以分为半官方性质与民间性质两大类。半官方性质的协会无疑是当下改革的主要对象。这些所谓的“协会”披着“独立的民间组织”的外衣,实际上大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官方组织。其中更有着相当的比例是前一阶段政府机构改革的产物。许多以前履行行业管理职能的政府机构,在市场化改革的压力之下,迫不得已变身成为所谓“自律性”的行业协会。这样一来,政府机构的规模在表面上缩小了;然而,极为微妙的是,人员还是那些人员,组织与运作方式仍然像个政府衙门。这些协会的专职主要是为政府办事,代表政府管理行业内的企业,而不是代表企业与政府和社会打交道。实践证明,这种形式主义的机构改革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后果。由于其中的工作人员无需承担公务员的责任,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司法机关对它的监管十分宽松,而它又不是会员制的,不必向会员负责,其结果是,各类协会成了监管的真空地带,腐败以及各种灰色活动大肆泛滥。工作人员利用其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方便”的身份,保媒拉纤,大搞权钱交易。各种暧昧的检査评比为什么屡禁不绝?大部分都是这些协会整出来的。为了安排若干下岗的政府官员,整个社会付出了重大代价,这值得吗?

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国足球协会。足球联赛曾经如火如荼,既为球迷带来了精神享受,又曾经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可是,由于体制改革未能及时跟进,足球联赛逐渐被腐败活动所吞噬,以致足球市场最终坍塌。一代球员的青春被浪费,广大球迷的心被伤透了,换来的是一大堆足协官员的锒铛入狱。笔者曾经长时期地感到困惑:要么沿用老的政府管理体制把它管起来,要么就让足协对俱乐部负责,而这种“两不管”算什么?难道机构改组就是不要造就一批只需用使权力、无需履行责任的官员吗?政府为什么要为这些人方便呢?这究竟是爱护他们还是祸害他们?这样的改革注定是不会成功的,用膝盖想一想就可以知道,为什么

还要进行试验呢?体育上的事向来不受重视,殷切的民意曾经长期被漠视,这更是不对的。中超联赛如今已经重新起步,而体制依旧。首批放开的四类社会组织仍然不包括体育,看来前途依然漫漫而修远。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这个协会在过去几年中曾经出尽风头;目前,随着钢市的凋敝,它也不再处于聚光灯下。然而,钢铁工业协会的创痛却依然留在业界的心头,挥之不去。在钢市兴旺的那些年头,中国数目众多的钢铁企业处于与少数国外铁矿石供应商相对立的境地。为了提高我方的谈判地位,钢铁工业协会登场了,因为它发现了自己可以一展身手的“大好机会”。然而,结果却是,在主流钢铁企业都是国家所有的大背景下,我们在这场国际商战中败得一塌糊涂;不仅没有争取到什么利益,反而丢失了原有的利益。按照郎咸平教授的估算,国内业界因此而招致的损失达数千亿元之巨。试想一下,假如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实行的是会员制,完全处于企业会员的控制之下;假如这场大型谈判由企业推举的采购专家而不是行政干部来组织的话,结局还会是这样吗?目前,政府部门忙于在钢铁业中淘汰落后产能。这场活动的实质是搞限产保价,它是违反《反垄断法》的基本精神的,其目的是让国内的消费者和买家来分担钢铁业失败的损失。殊不知,这样的活动进行得越深入,钢铁业的成本就会越高,其国际竞争力也就会相应地降低。不过,转机是有的。由于行业协会的成立已经放开,笔者在此祝愿由企业自愿组成的新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早日诞生,而且,完全可以成立多个协会,相互竞争,好的协会将为会员提供好的服务,也会抵制政府部门的不良干预。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佛教协会。佛庙寺院的腐败早已不是秘密。商业活动以种种方式侵入佛门圣地,惑乱修行者的心志。中国的佛教机构只是吸纳钱财和大兴土木的机器,绝对看不到其对社会的回馈,以及从事真正的慈善活动。笔者对此现象进行了思考。我冒昧以为,这正是缺少行业自律的结果。与其他伟大的宗教一样,佛教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博大的精神内容。我们可以认为,真正的僧人一定是能够自律的,而问题在于,现有的中国佛教协会是一个半官方组织,僧人对它的控制力过于薄弱。为了遏阻佛教界(以及其他宗教)的腐败,使之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有必要鼓励僧人和寺院实行自治。如果官方认为现有的宗教协会有必要予以保留的话,那么,可以允许和鼓励民间的其他宗教协会自由成立,彼此并行存在。为了顾及宗教的声誉,僧人中的领袖人物们一定会积极推动严格的自律管理。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至ppl18@126.com。

(作者为市场资深人士)